

winshare文轩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王国维画传》 窦忠如 著

《蔡元培画传》 金林祥 著

《陶行知画传》 储朝晖 著

《张伯苓画传》 梁吉生 张兰普 著

《胡 适画传》 邹新明 著

《梅贻琦画传》 黄延复 钟秀斌 著

《黄炎培画传》 谢长法 著

《徐特立画传》 靳贵珍 常顺英 著

《李 锐画传》 王 颖 高国庆 著

《陈鹤琴画传》 柯小卫 著

《晏阳初画传》 宋恩荣 杨华军 著

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突出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尤其凸显传主的教育家精神；强调以史料为依据，对传主的教育贡献作客观评价，实事求是，还原历史。这本身即是教育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顾明远

希望《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可以激励一批有志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

——储朝晖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主编：储朝晖

王国维画传

Wang Guowei Huazhuan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主编：储朝晖

王国维画传

Wang Guowei Huazhuan

窦忠如 著



定价：30.00元

文轩出品

王国维画传

窦忠如著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Wang Guowei Huazhuan

窦忠如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王国维画传

内 容 提 要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国学大师，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近现代教育领域也贡献突出。他在吸收西方教育理念的同时，逐渐形成与发展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发表了诸多教育方面的论著，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学贯中西，见识广博；不汲汲于名利，而孜孜于学术。他先后在通州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仓圣明智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留下了丰富的教育学术遗产；他参与创办并主编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20世纪初即开始向国内介绍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所译日本立花铣三郎著《教育学》，是近代中国学者翻译的第一部外国教育学著作。

本书以时间为序，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以文释图，以图补文，以崭新的历史视野，凝重的历史笔触，讲述王国维的学术生涯及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内容客观，叙事条理清晰，选图具有代表性，真实再现教育家的成长历程和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凸显教育家的教育精神与人格魅力。

本书适合教育工作者、大中学生及学生家长、大众读者阅读。

教育之宗旨何在？
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何谓完全之人物？
谓使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是和也。

——王国维



WANG GUOWEI HUAZHUAN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主编：储朝晖

王国维画传

窦忠如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13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画传 / 窦忠如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7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 储朝晖主编)
ISBN 978-7-5408-6320-3

I. ①王… II. ①窦… III. ①王国维(1877~1927)—传记—画册
IV. ①K825.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7016号

责任编辑	李 涛 郑 鸿
封面设计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张 涛
责任校对	伍登富
责任印制	徐 露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70mm×230mm
印 张	14.25 插页 3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总序

张明道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要提倡教育家办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急需教育家却又缺少教育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明确提出：“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然而，现今即使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怎样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却没有清晰的认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与时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安庆国在编写一套《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的想法上不谋而合，这对传承、传播中国20世纪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弘扬其教育精神和优秀思想，促进教育家办学的早日全面实现十分有益，也十分必要。

这套丛书所选择的十位传主是经过教育史专业的学者海选而产生的，他们是王国维、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晏阳初，我认为他们确实代表了20世纪对中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群体。

这套丛书突出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尤其凸显传主的教育家精神；注重以史料为依据，对传主的教育贡献作客观评价，实事求是，还原历史，避免主观，不做有意拔高；全书插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以图文并茂

的方式呈现历史画卷,使得丛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以及观赏性和可读性。同时,丛书主编精心挑选各位传主研究方面的专家担任各分册作者,较好地保证了整套丛书的编写深度和质量。其中黄延复研究梅贻琦、宋恩荣研究晏阳初、梁吉生研究张伯苓、戴永增研究徐特立、金林祥研究黄炎培、储朝晖研究陶行知都有二十多年了。我与储朝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他拿着一封方明的信来找我,正是为了查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陶行知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研究胡适、西南大学教授谢长法研究黄炎培、陈鹤琴外孙柯小卫研究陈鹤琴、青年传记文学作家窦忠如研究王国维,他们也都是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堪称黄金组合。这套书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各位教育家的精神真谛。

希望这样一套难得的好书,能激励有志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



论教育之宗旨

王国维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之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知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今试言其大略：

一、知育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

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识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二、道德

然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为动作也，非为知识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盖人人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诬也。书云：惠迪吉，从逆凶。希腊古贤所倡福德合一论，固为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皇而发挥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敬尔列尔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美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

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之前，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

而论之也。故教育之时，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本文撰写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表于同年《教育世界》杂志第56卷；

转引自《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5册），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版〕





一	激扬少年郎 科场绝举业	/ 001
	出身忠壮门 诗书传家久	/ 003
	私塾与家学 铸成少年才	/ 007
	折翅于科场 决意别举业	/ 011
二	青春多舛日 伯乐多扶携	/ 015
	“时务”谋生活 贤者失交臂	/ 017
	结识罗振玉 俊才得展露	/ 020
	变法激荡中 不废凌云志	/ 024
	畅游教育界 哲学辨疑惑	/ 027
	师范当教员 苦乐参半中	/ 036
三	辗转独自学 跨界任纵横	/ 041
	纵论《红楼梦》 开创新学境	/ 043
	静庵赋古诗 悲苦显于形	/ 050
	“词话”人世间 自夸成绝唱	/ 056
	五年京华梦 “生事之累”多	/ 072
	史海巧钩沉 戏曲大著述	/ 076
四	流亡奔东洋 异域治国学	/ 091
	异域忙避风 落魄度日艰	/ 093

	回归故国学 “善自命题”忙	/ 099
	千年龟甲片 成就罗王学	/ 111
	辗转忙归国 罗王互惜别	/ 123
五	哈园难就“食” 学人存风骨	/ 129
	“学术”大主笔 局促哈同园	/ 131
	密韵楼编目 为薪又为学	/ 140
	敦煌成显学 观堂发轫功	/ 149
	北大多邀请 一文致决裂	/ 154
六	京都获荣华 晚景凄仓惶	/ 167
	“行走”南书房 种下遗老嫌	/ 169
	清华岁月短 导师世称贤	/ 175
	罗王生裂隙 莫逆成陌路	/ 194
	五秩刚初度 世变扰人心	/ 202
	自蹈昆明湖 死因众揣度	/ 204
	把教育办得更好(代跋)	/ 213

一 激扬少年郎 科场绝举业





位于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的王国维故居。

在世人印象中，王国维是一个敦厚儒雅的纯粹学者。其实，少年王国维，意气风发，壮怀激烈，对人生和社会满怀憧憬，内心深处更是激荡昂扬，只因生活在“世变”年代，再加上不喜时文绳墨，最终决意告别科举，走上了倡导新学的艰难历程。

出身忠壮门 诗书传家久

南宋年间，远祖王稟与王荀的“勋绩忠烈”之举，成为深埋在幼年王国维心底的忠愤因子，而家学渊源又滋养了他的诗书情怀。

1. 远祖遗风

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县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的王家老院里。这个初名“王国桢”的男婴，是时任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幕僚王乃誉之长子，也是王乃誉的亲生父亲及兼祧父亲这两房合一的长孙。

据王国维于民国六年（1917）编撰的《补家谱忠壮公传》记

载，其祖籍河南开封，远祖王禀是宋靖康元年（1126）河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靖康之难”时，王禀与长子王苟率部在太原阻击金兵，因寡不敌众，最后怀抱宋太宗画像跳入汾河，以身殉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继位的宋高宗赵构，感念王禀父子忠勇报国，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忠壮”，王苟为右武大夫、恩州刺史，王禀的次子王庄任枢密院属官，幼子王蕤后来也官至浙西总辖。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又召见从青州就扈从自己的王禀长孙王沆，恩准其“袭封前爵”，并降旨任直隶临安府海昌城（盐官）建造安化坊，这就是浙江海宁王氏在此落根绵延之始。

另据《海昌胜志》记载，王沆定居海宁后，在城内、城南、城北分别建有“王氏园”、“清远楼”与“隅园”等。其中“清远楼”是王沆与文士名流雅集观潮之所，也是文天祥曾登临题诗颂扬之地。“隅园”，则因清高宗乾隆皇帝



故居内王国维铜像。



王国维故居内所列家世介绍。



盐官海塘。

曾驻蹕而赐名“安澜”，遂以此名传扬于世。到王国维出生时，这些胜迹都已毁坏无寻，只有安化王祠对他深具影响。

安化王祠，最初是王氏族人祭祀远祖王稟的家庙，又因王稟深受海宁百姓崇仰，遂逐渐成为官府进行忠烈教化的场所。南宋灭亡后，王氏家庙日渐衰落，海宁人却没有淡忘王稟，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将其改建为“安化王祠”。王国维出生时，安化王祠几经毁坏与重建，后来移建到海宁城东，并因抗清名士、大学问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撰有《宋安化王祠碑》而声名远播。对于这处记载远祖“勋绩忠烈”的祭祀场所，王国维从小就颇感荣耀，从而奠定了他人生的第一块基石。

除远祖王稟激愤忠勇的武德外，自王沆以降王氏家族在长达近八百年间浸淫诗书文品，为王国维的学人人生又添加了另一块基石。自王沆以降，虽然王氏后裔中除了王沆之子王恕、曾孙王辉分别荣登隆兴元年（1163）和绍熙四年（1193）的进士榜之外，其他全都寂寥无闻，但王国维后来在追述其先人时，依然特别强调其庠生、稟生或国学生的身份，这不难看出他对中国“诗书

传家”这一传统家训祖规的看重，也就是说儒学精神是他极为重视的一种人生品性。

2. 战争阴影

光绪十三年（1887），年仅十岁的王国维随家搬迁到新居——周家兜。当他路过当年海宁县城最繁华的陆家牌楼时，后人却为他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记忆：“这次搬家使王国维看到了西门外无一人影的瓦砾废墟，好奇地询问，从老人家口中知道了战斗的经过，使其心头笼罩上战争的阴影——恐惧的压抑。”这场战争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不过，王国维这“恐惧的压抑”，毕竟来自那场战争过后二十多年的残迹表象与他人的转述。作为亲历者，王国维的父祖们要比他记忆得更加深刻，因为这场战争对于海宁王氏家族而言，简直就是一场不能磨灭的梦魇。自宋建炎四年（1130）王洸定居浙江海宁后，传至王国维高祖王建臣时，已是第二十九代。王建臣生有三子：王淮、王溶、王瀚，长子王淮子嗣兴旺，次子王溶与三子王瀚均为单传。其中，王溶生子王嗣铎，王瀚生子王嗣旦，由于王嗣铎没有子嗣，故王嗣旦所生独子王乃誉兼祧两家，王乃誉就是王国维的父亲。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摧垮清军江南大营后，挥师投入浙江战场，与清军在钱塘江一线展开激烈争夺战。战火逼近海宁，王国维的曾祖王瀚不得不带领儿子王嗣旦与年仅十三岁的孙子王乃誉，逃往上海躲避战祸。在物价昂贵的大上海，举目无亲的王瀚祖孙三人，很快陷入困窘。不久，王瀚与王嗣旦相继亡故，孤贫无依的少年王乃誉，无力安葬祖父与父亲，最后只得“号咷呼吁，丐于亲故以敛”。随后，孤儿王乃誉背起铺盖，辗转于大上海的茶叶店、油漆店等杂货铺帮工谋生。多年后，生计毫无起色的王乃誉随海宁籍杂货铺老板回到海宁硤石镇，依旧在杂货铺里打工度日。再后

来，王乃誉应时任江苏省溧阳县县令的亲戚邀约，出任该县县令幕僚，才开始步入家境渐趋殷实之路。

期间，王乃誉迎娶凌氏为妻，并生有一女王蕴玉，家庭生活重担不减，再加上还要赡养兼祧父亲王嗣铎，他依然要外出谋事养家。在王国维出生两年后，由于妻子凌氏中道而逝，王乃誉只好将年幼长女王蕴玉和牙牙学语的长子王国维，托付给亲友照管。七八年后，王乃誉续娶本乡叶砚耕先生之女为妻，双仁巷王家老宅也翻盖一新，但他依旧是一个没有品阶的县衙幕僚，依旧要抛妻别子到外乡谋求微薄俸银以养家，直到年近不惑才在周家兜新建一座宽敞宅院（现海宁王国维故居）安居。而就在王乃誉处在事业巅峰和人生黄金阶段时，兼祧父亲王嗣铎不幸病故，妻子叶氏又身怀六甲，他只能按“丁忧”之制，辞去幕僚一职，开始了居家“以课子自娱”的生活。

王乃誉虽居家“以课子自娱”，但对于两岁就失去“母之恃”的王国维而言，因战争而导致的“恐惧的压抑”并没有得到排解，反而养成了他“性忧郁”的品性。

私塾与家学 铸成少年才

忧则生愤，愤而有成。生于忧患的王国维，经过刻板的私塾学习和父亲的严苛家教，逐渐在当地学子中崭露头角，并享有“海宁才子”之誉。

1. 旧学濡染

光绪九年（1883），王国维被祖姑母范氏等亲友送到邻近私塾就学，私



旧日私塾学堂一景。

塾先生是当地庠生（秀才）潘紫贵（字绶昌）。潘先生虽名不出乡里，但为人笃实严谨，教授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传统启蒙读物，至于《幼学琼林》和《神童诗》等也是他要求学童朗朗成诵的。熟读背诵这些典籍，原本是年幼学童的苦差事，可对于性情忧郁而喜欢幽静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

就学私塾几年间，王国维不乏摇头晃脑的死学苦读，但他对父亲王乃誉那“五六篋书”更感兴趣。原来，那“五六篋书”并不是王国维讨厌的《十三经注疏》之类，而是他喜欢的金石、考据、绘画和书法等“课外书”。正是这些“课外书”，在无意中竟引导王国维走上了他后来从事的学问之路。

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后，改字承宰，号娱庐。王乃誉自祖父与父亲亡故后就成了孤儿，在他辍



王国维幼学启蒙模拟场景一。



王国维幼学启蒙模拟场景二。

转上海与海宁当学徒期间，每日闲暇以攻读钻研诗词歌赋与金石书画为乐，这使他与一般帮工学徒有所不同，也因此变得更加机敏而大获老板偏爱。王乃誉的自学精神与不凡悟性，从他流传于世的诗集、游记画论及金石研究等诸多著述中不难看出，诸如《游目录》（十卷）、《画衍》《古钱考》《画粕》《题画诗》《可人》《竹西卧游录》及《娱庐诗集》《娱庐随笔》等等。

对于父亲王乃誉自学成才的经历，王国维曾记述说：“（王乃誉）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由是技益大进。年四十，归，遂不复出。唯一游金陵，一沿桐江，观富春山，登钓台，皆不数月而归。归后，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王乃誉勤勉的自学精神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对少年王国维产生了极大影响。

不过，兴趣广泛的王乃誉，在教养长子王国维方面，却显得有些刻板教条，甚至是过于严格苛刻。也许是他官场上见识太丰富复杂，也许是他望子成龙的心太切太甚，也许是因他自视太高而对王国维的要求也太过完美，反正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后，对王国维几无褒奖，只有严厉的苛责与批评。

2. 不废新知

王乃誉居家“以课子自娱”的唯一心思，就是希望王国维在科举道路上获取成功。因此，在王国维入学私塾不久，王乃誉就为他择了一位名师——陈寿田。新型知识分子陈寿田先生，曾在京城同文馆师从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出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的李善兰，是中国继明徐光启之后，以翻译介绍西方数学与天文学而著称的大科学家。早在咸丰元年（1851），他就在上海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和《谈天》等西方近代科学书籍。其中，尤以介绍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及牛顿古典

力学的《谈天》一书，而被国人视为“异人”。同治年间，“异人”李善兰以三品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之职，就任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

作为清朝最早洋务学堂之一的同文馆，主要为了培养外务翻译人才，而担任教习的多是外国人，像李善兰这样精通西方科学文化的中国教习，较为少见。同文馆设置课程广泛，主要是近代西方先进的人文自然科学，诸如算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理、法律、历史、地理等，还开设有英语、法语和俄语等课程，这对当时陈腐保守的中国学界来说，就像一股新鲜而强劲的晨风，猛然吹开了紧闭多年的老屋门扉一样，使憋屈的中国知识分子顿感无比振奋。于是，有识之士都以能进入同文馆就学为第一要务，但能就读其中者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而浙江海宁的陈寿田就是其一。

陈寿田是幸运的。刚接受启蒙教育的王国维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接受知识的最佳年龄段，得以师承陈寿田这样的名师。当然，王国维的幸运，还源于他有一个严苛又开明的父亲，否则他还在儒生潘紫贵先生那所私塾里，继续接受着绵延千年且已变得腐旧僵化的应试教育呢。虽然父亲让王国维转学于陈寿田门下，同样是为了科举，同样要学习那些应试的八股文体，但西学的种子就此植进了幼年王国维的心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奠定了基础。

折翅于科场 决意别举业

科举路上，少年王国维先扬后抑，再加上新学倡行，使他逐渐对科举及第失去兴致，最终绝意科场，走上了独学之路。

1. 科场初试

在师承陈寿田的几年间，王国维除了得到西学启蒙外，主要任务是遵照父亲意愿攻读应试典籍。这时，父亲王乃誉就像是张弓搭箭瞄准围场中一只白鹿的猎人，由于自身臂力不足而未能射中后，便将儿子王国维当作一支新箭，正搭在将要拉开的弓弦上，或者说儿子王国维是他重点培养的新一代猎手，反正目标只有一个——科举及第。

光绪十七年（1891），在名师和严父长达九个寒暑的严苛教授下，王国维在县试和州试中顺利过关。特别是在州试中竟以全海宁州第六十名而晋级，从而获得进入州学就学的资格，成为海宁州州学的一名生员，也就是一名秀才了。不过，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王国维在府试前的一次预考——岁考的结果，即王乃誉在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所说“出之桥，陈四云案出，静儿（王国维）在后挈健儿（王国维之弟王国华，字健安，后改哲安）之州前看图，喜名在第三图”。

顺利通过县试、州试和府试的资格考——岁考之后，王国维这个年仅十六岁的“童生”，声名鹊起，遂与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被当地民众誉为“海宁四才子”，而王国维当推第一。因此，父亲王乃誉对王国维来年在杭州参加府试满怀期待。

2. 才子失意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才子王国维意气风发地前往杭州参加府试，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海宁来到杭州。站在江南名邑杭州城华美的街市上，王国维以羡慕的心情浏览眼前的一切，特别是官家那轰轰驶过的威武车轿，使他产

生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与渴慕。不过，杭州城虽美不胜收，可王国维在府试中的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具体情形，如今只能从父亲王乃誉的日记中获知点滴：

“静儿杭回，知考而未取。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及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尚何怗于有司之不明，实愚而好自用也！”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国维又经过一年多的进一步学习，再次前往杭州参加恩科考试。关于这次恩科考试的情形，与王国维“相偕”赴杭州应试的“海宁四才子”之一陈守谦，后来这样记述说：“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对于王国维这次参加科考竟以“不终场而归”的做法，父亲王乃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表现得极为愤怒，而是在无可奈何中为儿子想到了科举及第的另一条捷径——进入杭州崇文书院就读。原来，在清朝科举制度中有一种变通的方法，即府试未通过者，如能考进官设书院就学并肄业的话，便可免除府试和院试，而直接参加乡试。而这时，对时文绳墨已失兴致的王国维，对崇文书院主要教授八股的传习，根本没什么兴趣，再加上书院各项费用开支较大等原因，不久他便离开书院回到了海宁老家。

不过，因为王国维已有崇文书院生员的晋升之阶，父亲王乃誉还是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功名，因为光绪二十年（1894）是清政府规定的三年一次的乡试年。遗憾的是，这一年实在是大清帝国的多事之秋，其中一事就是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而这场战争对王国维的直接影响，便是失去难得的乡试机会。

3. 绝意举业

科场失意的少年才子王国维，回到海宁后一边关注时局，一边充任私塾先生，以获取微薄薪水补贴家用。因为自父亲王乃誉辞掉幕僚工作后，家中

除正常日用及王国维与王国华兄弟俩读书等开销外，姐姐王蕴玉出嫁时也花了一笔陪嫁钱，这让王乃誉感到了家庭经济的支绌。

更让王乃誉伤神的是，儿子王国维因为热衷新学而对科举毫无兴趣，又因当时国内掀起留学热，王国维一心想到国外留学，可由于家境不济而难以如愿，导致他心情郁闷，整日不思私塾教职。王国维的这种心境，让父亲王乃誉既感担忧又很无奈，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让儿子参加科考的最初想法。

为了缓解王国维的苦闷心情，父亲王乃誉为儿子选择了一门亲事，并“将□熙门之产售去”，换得一千余元以作王国维结婚之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国维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成婚。婚后，王国维在同乡陈汝楨（字枚肃）家充任私塾先生的同时，还按照父亲意愿准备着来年的乡试。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年后，王国维在父亲催迫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再次来到杭州参加乡试。随着这次的乡试不第，王国维从此彻底断绝了科举念头。

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已经成婚的王国维辗转几家私塾任教后，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艰难的谋生征程。

二 青春多舛日 伯乐多扶携





老上海。

北上上海谋生的王国维，可谓青春多舛，直到偶遇伯乐罗振玉，才在他的扶携下开始真正踏上追求新学、探索新知的正途。

“时务”谋生活 贤者失交臂

前往上海谋生的王国维，其实是被维新名士、《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所吸引。遗憾的是，当王国维追寻大师而来时，梁启超却因故离开了《时务报》馆……

1. 北上上海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三日，过年气氛依然流淌在浙江海宁的街巷间，但王乃誉与王国维父子俩却要打点行装出门了。

王国维北上上海“谋生”的地点，是当时中国维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时务报馆。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九日的《时务报》，是根据“南海圣人”康有为的统筹策划，由维新干将黄遵宪与汪康年等利用强学会剩余经费及社会募捐，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专门宣传维新思想的旬刊。在《时务报》创刊前，康有



康有为。

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受命来到上海担任该报主笔，从而使《时务报》迅速成长为当时众多新学报刊之翘楚，由此也使梁启超更加声名卓著。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王国维就开始接触并矢志追求新学，“每思自奋”，“但以家贫，不能游学”。对此，王国维常常“居恒怏怏”，但并没有放弃对新学的追求，而是到处搜求新学报刊以自学。特别是当时由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他更是从创刊号开始，每期必读，有一次竟携带“四十五六册”归家后挑灯阅读。

如今，王国维虽然是因为在时务报馆任书记的同学许家惺有事返乡，而得以替代他前来上海时务报馆就职，但是内因则是由于他仰慕梁启超及由其主笔的《时务报》而来。遗憾的是，当王国维热切地赶往上海时，梁启超却已因故离开报馆，前往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去了。

2. 艰难谋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元宵节前，王国维在父亲王乃誉的陪护下来到时务报馆，报馆经理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父亲王乃誉将自己多年在外谋生的教益向儿子再三叮嘱，便返回了海宁老家。从此，王国维开始了艰辛的独自谋生历程。



青年梁启超。

在时务报馆里，按照先前与“导夫先路”许家惺之约，王国维替代其书记之职。而事实上，王国维不仅要抄写、校对等书记的工作，还兼做报馆门房收发信件和接待来客等杂事。在这期间，王国维得以师从“康门弟子”欧榘甲，并有幸拜见了当时国人极为仰慕的“康圣人”——康有为。遗憾的是，儒雅谦和的欧榘甲随后也辞职到长沙与梁启超共同任教于时务学堂。这让王国维失去了报馆唯一可以倾心交流的良师益友，再加上汪氏兄弟将报馆诸多冗杂琐碎俗务全交由倾心新学的王国维处理，这使本想致力于新学追求的他，逐渐产生了离开时务报馆的念头。对此，父亲王乃誉再次写信予以劝诫：

汝此出以家累身世计为第一义，然此中明师益友相接，汝其择事之。所谓增长气识，潜浚心智，不当以些小之不适，而泮决向意。所陈搬入总理房，人杂事冗，势所然也，特汝性不近此，正亦为念……如能勉志相习，处一二月亦能相安。

按照父亲王乃誉的教诲，王国维忍耐了两个月后，又因为薪水缘故与汪氏兄弟产生了嫌隙。原来，按照替代同学许家惺任报馆书记一职而言，王国维认为其薪水应该与许家惺一样是每月二十元，而账房先生仅按每月十二元为其结算，这让王国维感到既惊讶又气愤。于是，王国维在与账房先生争辩无果后，便写信向“导夫先路”许家惺详细诉说道：

今日账房戴恺翁致送正二月薪水，除阁下还仲阁先生六元，及阁下年底赏项一元，弟支过六元外，仅洋十一元。弟不胜惊异，诘以何故？伊云，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因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

对此，老同学许家惺也感到报馆这种做法确实对王国维不公，遂写信向汪氏兄弟予以说明。不料，汪氏兄弟不仅没有为王国维追加薪水，反而在给许家惺的回信中将王国维数落了一番，诸如王国维不善办事、待人处世不周等等。当王国维从许家惺处得到这样的信息反馈后，性格木讷、不善言辞的王国维不仅没有据理力争，反而遵照父亲以忍让为先的教诲向许家惺复信，以表达老同学对他“不督过而惠全之”的感激。

这就是“老实如火腿般的”学者王国维！

结识罗振玉 俊才得展露

王国维就职时务报馆期间，偶然结识中国近代又一位学术大师——罗振玉，从而开启了他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新路程。

1. 偶遇伯乐

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罗振玉，乳名玉麟，初名宝钰，后改振钰字式如，又改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因其祖籍在浙江上虞永丰乡，遂自称永丰乡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也是王国维在时务报馆偶识的人生和学问伯乐。

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偶识之事，陈鸿祥先生表述说：“那时，罗振玉是时务报馆的常客，他的书信，亦多由时务报馆转达，故他不但经常与汪康年兄弟往来，并且会与做着时务报馆门房和收发的王国维见面交谈，乃在情理之中。”这是陈鸿祥先生的揣测。不过，陈鸿祥先生随后在其著作中例举了刘

鶚之孙、罗振玉之外孙刘蕙孙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11月5日发表在上海《人世间》杂志上及收录在199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的两篇回忆文章，作为其揣测的佐证。因陈鸿祥先生在例举中不乏考证，为尊重其劳动成果，特摘录如下：

证言之一：刘先生回忆说，罗雪堂（振玉）在上海办农报馆，王国维同乡许某（即许家惺）荐他去时务报馆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报馆，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再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罗门弟子。

陈鸿祥先生还补充说：“这是刘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的，距王国维去世仅七八年，并说当他写此文时，‘尚有一些顾虑’，有些事没有写。于是，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本人去世前数年（1987），又补写第二个回忆。”即：

证言之二：刘先生说，1930年夏我去旅顺罗家时，一天晚上雪堂先生和我说：他和静安先生相识，是某年正月初二，去汪穰卿（康年）的时务报馆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个



青年罗振玉。

小房间里有一人，桌上放着一包花生，摊着一本书在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就走进房去。一看，原来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得奇怪，就进而问讯，其人也起身让座，才知是《时务报》的校对员海宁王静安。坐下攀谈，觉其人才华学养都不平凡。就劝王去南洋公学读书，说王有个秀才功名，可以进师范班。自己是公学监督，可以为力。静安说：奈生计何！因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元。雪堂就说：“你去读书，我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给《农学报》写点东西。每月工资四十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静安先生就这样入了南洋公学东文班。

就这样，在时务报馆“成骑虎之势”的王国维，在偶识伯乐罗振玉后，便得以就读东文学社，从而为他打开了一扇追求新学的明窗。

2. 就学东文社

光绪二十一年（1895），罗振玉痛感甲午海战反映出中国贫弱之状，又在康、梁“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的激励下，积极联络友人准备在淮安创办“淮安西学书院”，意在培养西学人才以振兴中国。后来，罗振玉这一设想因未能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而流产，但他向心西学的志向并没有气馁或改变，而是于第二年前往上海创办学农社，并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农学杂志——《农学报》。

在此过程中，罗振玉因报馆缺乏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遂聘请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科的藤田丰八（字剑峰）为译员。藤田剑峰受聘后，学农社遂成为中国新学人才和日本学者聚集交流的中心，《农学报》也由半月刊改为旬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为增加。不过，罗振玉明白学农社和《农学报》仅靠藤田剑峰一人，是难以实现他创办集翻译、办报、出版和发行为一体的农业“托拉斯”之宏愿。于是，对罗振玉深表理解和赞赏的藤田剑峰，便

建议罗振玉开办一所属于自己的日语学校，为学农社和《农学报》培养急需的日语翻译人才。

为使东文学社顺利创办起来，罗振玉与学农社的最初加盟者邱宪（字于藩，又字崧生，号啬庵）、蒋黼（字觐宸，后改字伯斧）等好友积极进行筹划，并与时务报馆总经理汪康年商量合作，因《时务报》也急需译介日文报刊人员而一筹不展。于是，由罗振玉和以上三位及江苏溧阳热心新学的狄葆贤五人共同发起的东文学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正式创办了。

根据创办者最初约定，参与创办各方（实际上只有罗振玉的学农社和汪康年的《时务报》两方）所属人员中的贫困生可免除学费，但学员必须为各方机构提供服务。例如，王国维入学东文学社就应该为时务报馆工作。因此，王国维在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同时，也就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时务报》馆汪氏兄弟之苛责，这就是他给同学许家惺写信中提到的“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一句无奈之语。而王国维入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后，由于他那一口难懂的海宁地方官话，实在不利于学习本来就拗口的日本话，致使他在当年五月考试中不及格。为了帮助王国维顺利完成东文学社学业，罗振玉特许王国维留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业。



中国近代第一份农学杂志《农学报》。

王国维因何能得到罗振玉如此的垂爱呢？据说，罗振玉知遇王国维实在是一个偶然，而偶然的起因仅仅是一首诗，一首王国维写在东文学社同学扇面上的《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罗振玉偶然得见这首诗时，对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两句极为欣赏，遂特意将王国维找到办公室详谈。这次深谈，使罗振玉深刻感受到王国维的文史功底和远大志向，也进一步获知了王国维的家境及当时所处的艰难境况。于是，罗振玉当即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一切费用，并让其参与管理东文学社事务，使其在获得一份薪水解决困境的同时，也得以安心顺利地完成学业。

变法激荡中 不废凌云志

维新变法，使心向新学的王国维先是激荡满怀，继而扼腕浩叹，但是作为热血青年的他，并不曾废弃“千秋壮观”之志。

1. 问天之慨

由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日颁行《明定国是诏》为启动标志，至同年九月十八日颁布《上谕档》，限定光绪皇帝此后处理一切政务“均鉴拟办法，恭呈慈鉴，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再到三天后

光绪皇帝被囚禁中南海瀛台为止，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当这一消息传来时，倾向维新的热血青年王国维“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

其实，对于康、梁倡导实施的这场变法，王国维在此前三个多月就作出了预言：“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做去，做到一分就算一分。”不过，当康、梁正式发动变法时，还是给王国维带来了一种振奋和疑虑。诸如他对朝廷颁布废八股、开特科、裁冗员和改武备等条款表示欢迎，而对罢黜积极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大员帝师翁同龢而调用直隶总督王文韶一事又感到心中疑惑。对此，王国维在写给同学许家惺的信中说：“连日读上谕，均有怵惕振厉之意。又常熟（翁同龢）罢相，实非意料，足为天下庆幸，但去翁而召王（王文韶），一间耳。”由于“戊戌变法”风云莫测，这让王国维隐隐有些担忧，而这种担忧终于在103天之后得以验证。

期间，王国维因为腿患“鹤膝风”病症，不得不回到海宁老家治疗休养。同时，他也避免了搅入时务报馆内部的一场“争报”风波。只是，人生于天地凡俗之间，悲愤痛楚之事不可预料，因为出生仅两个多月的长女竟于同年八月八日夭折了。这让王国维夫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丧女之痛中不能自拔。然而，除了悲愤、感慨和痛楚之外，王国维还要继续生存下去。于是，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国维再次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而这次到上海“谋生”又是得益于一直关注他的罗振玉之扶助。

2. 重返东文社

在王国维回海宁治疗腿病前，罗振玉将学农社事务交给蒋黼和藤田剑峰管理，自己则回到江苏淮安看望年迈父母去了。

这期间，“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因创办学农社名列维新名士的罗振玉，

却安坐家乡老宅。变法失败后，诸多倡导维新的社团、学会和报刊被强行取缔，临时主持《农学报》的蒋黼见状，也主动将报馆关闭了。这时，罗振玉不顾亲手创办并受到光绪皇帝赞誉的维新会社——学农社惹祸上身，义无反顾地从江苏淮安返回上海，直接投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将学农社和《农学报》等交由上海农工商局主办。而刘坤一这位深得慈禧太后器重的封疆大吏，不仅没有解散学农社、接管《农学报》，反而鼓励罗振玉要打开学农社大门，广泛开展交流活动，并责成上海道拨款两千元扶持罗振玉继续创办《农学报》。得到地方当局大力支持的罗振玉，又自筹资金将汪康年和蒋黼等从中脱离的东文学社重新开办起来，并邀请王国维担任东文学社庶务。这就是王国维重返上海的缘故。

期间，王国维的日语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并结识了诸多日本籍学者友人，特别是一位名叫田冈云岭的日籍教员，成为引导他进入西方哲学堂奥的引路人。不过，当时由于“文字睽隔”，王国维虽然“心甚喜之”，却只能留下“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的遗憾！所幸的是，东文学社随即开设了英文等外语课程，使王国维逐渐读懂并接受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观点，并由此奠定了他悲剧性格的哲学基础。

3. 短暂留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王国维从时任杭州知府幕僚的好友高啸桐处得知，浙江将开设官费“出洋考试”。三月，王国维在罗振玉的支持下，来到杭州准备参加这场“出洋考试”。不曾想，这次“出洋考试”因抚台大人“老眊善忘，考验须迟”，王国维只好先回海宁等候消息。

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致使王国维出洋留学就此搁浅，罗振玉的东文学社也提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年秋天，王国维被罗振玉

安排住在自己家中，一边帮他办理《农学报》，一边等候留学时机的到来。鉴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之局势，罗振玉建议王国维先到日本留学比较可行，并表示愿意提供留学东洋的一切费用。

就在这时，罗振玉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与此同时，辛丑年春节也为时不远，王国维接到藤田剑峰从日本写来的信件，说他已为王国维留学日本联系好学校，并准备亲自到上海来帮助他办理前往日本的相关事宜。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九日，王国维登上日本三菱公司的“博爱丸”号轮船，踏上了他梦想多年的出洋留学之路。

到达日本后，王国维接受藤田剑峰的建议，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就读。在这里，王国维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将白天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就连晚上也不肯浪费。不过，属于理工科的物理学等课程还是给王国维带了麻烦，学习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让王国维的心里很着急，从而导致他的腿病复发，不得不于同年六月二十六日提前回国。

王国维虽然在日本总共只学习了四个多月，不能算是学有所成，但眼界却比以前更开阔了，思路比以前更清晰了，追求也比以前更加深远宏大。那么，回到浙江海宁治疗腿病的王国维，今后将何去何从呢？

畅游教育界 哲学辨疑惑

在海宁治疗腿病的王国维，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教育改革，当老友罗振玉顺应时代潮流，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时，他携西哲理念应邀加盟，使其“前卫”的教育思想得以畅游其中，并迅速成长

为蜚声海内的教育名流，就此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历史地位。

1. 倾心教育

王国维教育思想的体现，是从编撰学堂教材开始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秋节前夕，王国维接受罗振玉之邀，前往武昌担任农务学堂的“译授”。不料，农务学堂教学事务虽然简单，但是其间人际关系较为复杂，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心思依然留在上海，留在《农学报》和刚创办的《教育世界》这两份杂志上。对于《教育世界》，王国维赞同罗振玉提出的“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曰‘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之意乎”这一创刊宗旨，并在创刊不久便将留学日本期间翻译的立花铤三郎所著《教育学》分期连载其上。既然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心思不在农务学堂，那么他们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上海方面来了。

在这期间，王国维按照罗振玉的提议，编撰中小学堂教材，翻译日本学者的《日本地理志》《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及《法学通论》等书刊，而这都是中高等师范学堂的教育用书。同时，王国维因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引起了上海南洋公学创办者盛宣怀的瞩目，遂于当年十一月向王国维发出了到南洋公学任教的邀请。不过，王国维当时正协助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且主要精力放在编撰中小学堂教材和为杂志翻译文章方面，故他婉言谢绝了盛宣怀的邀请。

两个月后，罗振玉辞去武昌农务学堂监督之职，受张之洞派遣带领湖广两地部分教育人士前往日本考察。罗振玉走后，王国维也从武昌经上海，返回海宁过春节。节后，罗振玉就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王国维也来到南洋公学任职。接着，王国维以南洋公学东文学堂“执事”身份，前往日本聘请

日文翻译人才,因为这时罗振玉既是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监督,又被张之洞委派协助办理江楚编译局事务,而江楚编译局严重缺乏日文翻译,故特派熟悉日本情况的王国维东渡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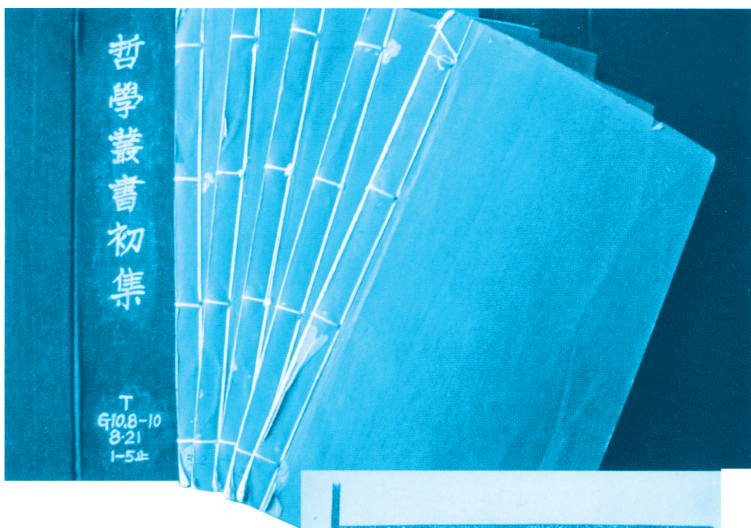
在日本近两个月的考察中,王国维虽没能为江楚编译局请来“译手”,却对日本近年来翻译西方书刊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特别是通过西书翻译对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使他深切感受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这为他随后大量翻译西方教育和哲学名著提供了强劲动力。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国维翻译了日本立花铎三郎编著的《教育学》,这是引进中国的第一本全文翻译的《教育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编著了一本合辑的《教育学》的概要,这是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这两个“第一”是奠定他足以名垂中国教育学史册的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王国维从日本归来,而此时罗振玉已将目光转向“兴办地方教育”方面,对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和江楚编译局协办这种虚位失去兴趣,故没有问询王国维到日本聘请“译手”一事,而是与其商量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外文书刊翻译之事,只不过将原先注重翻译农学书刊转向了教育方面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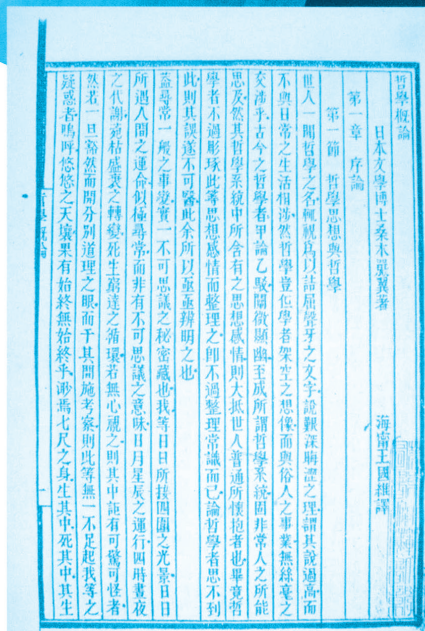
王国维像,刊于《教育世界》
第一百二十九号。



2. 浸淫哲学

早在两年前，罗振玉就了解到王国维对西方哲学颇感兴趣，而今他从日本回国时，更是自费购买了大量西方原版哲学书籍，使其思想和见解大有新意。于是，罗振玉邀请王国维编译《哲学丛书》，以供《教育世界》刊发。随后，罗振玉前往苏州筹办江苏师范学堂事宜，而王国维则返回海宁老家埋首畅游在西方哲学的海洋里。

确实，早在东文学社时期，王国维就对西方哲学“心甚喜之”，如今更是



《哲学丛书》初集本
《哲学概论》。

立志“从事于哲学”研究。对此，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记述说：“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随后，王国维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直接从海外邮购了许多哲学书籍，诸如文德尔彭的《哲学史》、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海甫定的《心理学》、耶芳斯的《逻辑学》和翻尔彭的《社会学》，以及他早已神往的康德之《纯理批评》与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盛夏时节，在浙江海宁周家兜一处幽静的青砖灰瓦庭院里，王国维临窗而坐，窗外是滚滚而来的钱塘江潮，窗内则是王国维与西方先哲的心神交流。只见他时而愁眉紧蹙，旋即又舒展胸怀，将深邃目光延伸向浩淼无边的江潮。这时，人们不知道他是在和叔本华交流“意志表象”，还是与康德进行着“理性批判”的探讨，抑或是陶醉在文德尔彭、巴尔善、耶芳斯和海甫定等哲人们的精彩论述中。对此，人们今天在王乃誉老人于这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



王国维故居可以观潮的窗口。

读到了这样一句话：“静之不往，为高乎？抑不惜此区区功名耶？”

就在王国维浸淫在西方先哲深邃奥妙的哲学世界时，他关于哲学和教育学的诸多译著，连续刊登在已引起学界瞩目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并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同年十月，王国维先后接到京师大学堂和通州（今江苏南通，本书中所指的通州均指江苏南通）师范学堂的邀请，而王国维当时正沉浸在对哲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的潜心研习中，不愿放弃这“半途未竟”之研究，故想推迟一两年后再出外就职。后来，王国维经与父亲王乃誉和罗振玉商量后，遂决定就任由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国文和心理学两科教员。

3. 哲学辨惑

经历“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为了缓和统治阶级严重的内部矛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二十九日颁行“新政”诏书。在这被历史工作者称为“辛丑变法”的新政中，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生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成效最明显的莫过于教育改革。

由于直接推动这场变法特别是教育改革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实力派封疆大吏，所以教育改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诸如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各省市县务必开设高中小学堂，以普及新式教育等等。不过，正因这场教育改革是由张之洞等表面倾心新学实则守旧的朝廷大员所领导，致使教育改革内容并不彻底，或者换种说法是“新瓶装老酒”而已。如果这是朝廷从改革进程宜于稳妥推进而着眼的话，王国维也许能够理解，但随着张之洞向朝廷递交《陈学务折》，要求从大学堂中删除哲学这一学科，就让已深谙哲学对于人生问题之重要性的王国维不能表示认可了。于是，王国维心中涌起当年“条驳”大学者俞樾《群经平义》时的一股激情，一气呵成撰写了《哲学辨惑》一文，刊发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教

育世界》的第五十五期上，对张之洞认为哲学是有害无用之学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辩驳。

在王国维学术生涯的这第一篇论文中，他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辩驳：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哲学研究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为了深入透彻地诠释以上论点，王国维根据康德“三大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知（理性）、情（美学）、意（伦理）”之间关联，对教育的最终目的进行开宗明义的阐释：“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

既然如此，王国维便进一步指出：“试读西洋哲学史、教育史，哲学者而非教育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解剖而言医学，何以异？”虽然这话语被王国维说得有些犀利，但道理则太浅显不过了。所以，他接着指出中国近代哲学之所以不昌盛的一种原因，并勇敢而睿智地提出了自己的“预言”：“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在这里，王国维提供给人们的，不单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还涵盖“中学”与“西学”的整体关系，也就是近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之辩证。当然，王国维非常明白他之所以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并“非欲使人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而是认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但“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万为要”。最后，王国维似乎是

在为张之洞等“欲废哲学”者进行开解，他说：“吾国人所以诟病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之性质之故。”然而，正是因为国人“不知哲学之性质之故”，王国维更觉得在大学堂开设哲学一科是极为重要的。

4. 教育宗旨

紧接着，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五十六期上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从正面对当前教育“宗旨”进行了精辟阐述，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就或培养德、智、美、体的“完全之人物”。

为贯彻这一宗旨，王国维写了大量相关文章，特别是自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全面主持《教育世界》编务后，开始对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撰写了一系列阐述教育宗旨和积极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比如，在《教育世界》第六十八期上刊发的《本报改章广告》中，王国维明确地表达了办刊宗旨：“一、因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载各国良法宏规，以资则效；三、录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动。”经过“改章”后，《教育世界》迅速赢得教育和社会各界的如潮好评，王国维也因此更加展露出他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卓越见解和“哲学专论者”的非凡哲思。

关于王国维通过《教育世界》杂志阐发的教育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站在哲学高度阐述教育的最终宗旨。在《论教育之宗旨》中，王国维开宗明义提出，教育就是培养“完全之人物”。对此，王国维借用康德“知、情、意”理论，将其总结为“四育”，即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至于德育，王国维认为：一个人即便学富五车，如果道德败坏，那他不仅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佳音，还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所以道德教育应该放在教育的首位，并要慎重地从心灵深处入手，而不是空泛简

单的理论灌输。智育，王国维指出不仅仅是要学生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应该注重对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首次提出“美育”的概念，这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王国维在文章指出，教育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在轻松愉快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

其次，倡导教育改革，探索教育改革的新思路。之所以说王国维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不仅在于他率先提出先进的教育思想，还因为他提出了诸多切中教育时弊的观点，并探索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中国当时刚设置高等教育又不知其为何物时，王国维率先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开列出大学各科科目，使大学堂应设的教学内容有所参照和依据，对当时在这方面还比较模糊的观点予以廓清。例如王国维就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三者间的关系进行辩证论述，认为当前最薄弱的是师资力量，所以创办师范学堂是当务之急，只有在大学堂中先培养大批新型教育人才，才能使中学堂和小学堂真正开办起来。当然，也只有中、小学堂办好了，才能源源不断为大学堂输送人才。对此，王国维认为：“未有小学、中学美善的豫教，不能有美善之大学；小学、中学既美善矣，非有美善之大学，则好学之徒，亦无由以进修高等之学问。”例如，对于大学堂教育最终的定位问题，王国维指出大学堂应是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学，更不可能“以示世界”。王国维之所以看重这一点，还在于他将学问提高到关乎国家昌盛与否的高度，也就是说只有学问昌盛才是一个国家繁盛的标志。而要达到学问昌盛国家繁盛这一目的，王国维睿智地指出：学术应该脱离政治羁绊，成为一种独立、自由之门类，政府更不该沿袭已经沿袭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以官职爵位引诱学者，使学问的终极目的直抵仕途这一途。对此，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中提醒说：“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的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

夫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唯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王国维的这些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也有着入木三分的警世作用。

第三，积极投身到教育实践中。王国维除了翻译、撰写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外，还先后在罗振玉创办或主持的上海东文学社、武昌农务学堂和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职，参与其中的教育实践事务。当然，如果将王国维投身教育实践的时间再往前推算的话，还可以举出一则不太为人所知的其倡议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堂未成之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国维初到上海时务报馆“谋生”时，曾与同学许家惺、张英甫、钱东府等人商量在家乡海宁创办师范学堂，并站在时代前列阐明创办新式学堂的意义，还就筹集资金、选择地址等具体事宜，制订了比较详细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设想，王国维直接或间接地向海宁知州和杭州知府提出建议，可惜他当时只是年仅二十一岁且名不出乡里的秀才，这一建议未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流产。

师范当教员 苦乐参半中

教员王国维，从最初当私塾先生算起，直到他投身颐和园昆明湖为止，可以说贯穿其一生，苦与乐也贯穿其一生。

1. 南通执教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下旬，王国维应邀来到位于通州三元桥畔的千佛寺，因为这座寺庙已被末代状元张謇改作了师范学堂。

咸丰三年（1853）出生在江苏南通的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光绪二十年

(1894)春,张謇被光绪皇帝钦点为状元,随即又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而他却辞官不就,返回故里创办实业去了。张謇苦读多年却不为仕途之动因,源于他很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士大夫所以丧名败检,皆由一进之后,欲退不能,故不能退则不进。”如此看透名位的张謇,返回家乡先后创办了纱厂、铁矿和轮船公司等实业,为振兴中国近代实业特别是轻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以状元之身创办实业获得巨大成功的他,对兴办教育事业也十分热心,一生创办了诸多新式学堂,特别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杰出教育家的历史地位。对于这所师范学堂,张謇曾评说道:“后人之知中国师范自通州始,必不知道司激成之也。”这里的“司”,即指当时以种种理由阻挠他创办师范学堂的一个地方官员——“藩司”吴重熹。

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二十七日,通州师范学堂开学了。有资料表明,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的,主要是由罗振玉推荐的日本人,中国教员只有王国



通州师范学堂。

维一人，且名列教员首位，由此可见王国维受张謇器重之程度。不过，在教学过程中王国维却并不受学生们欢迎，据当年一位学生回忆说：

著名的近代学家、考证学家王国维，他曾是通州师范初期的教师，在校时间不过半年，教的伦理学和国文。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年龄比一般学生还小，再加所写的讲义多从日文翻译过来，不能像一般古文那样顺眼，因而在举贡生监出身的学生们眼中，也没有得到尊重。

在近一年的教学过程中，王国维生活得并不如意，就连结束这学年教学工作返回海宁途中，他还遭遇了一件窝心事，致使大病一场。原来，遵照当初签订一年的教学协约，王国维在即将完成这年教学任务时，从罗振玉和藤田剑峰处得知将有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遂于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二十八日离开了通州师范学堂。不料，就在王国维乘坐“美顺”号轮船从通州返回海宁途经上海，当晚在上海浦东码头提取行李时，才发现行李箱上的锁已经掉落，导致箱内物品散落一地，一些衣物、书籍和临行前张謇所书赠条幅浸水失落，一年来节余的一百元鹰洋薪水也不见踪迹。为追讨丢失的物品，王国维在上海盘桓了十余天，据陈鸿祥先生说“被窃的钱物中有张謇写的条幅，已经索回”，至于是向哪一方追讨的，至今没有确切说法。

2. 苏州变故

光绪三十年（1904）春节过后，王国维在海宁并没有等到公派出洋留学的消息，却接到已就任江苏教育顾问的罗振玉的邀请，出任《教育世界》的真正主编。不过，王国维在此前还曾前往苏州，就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一职，那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段黄金时光。

在园林城市苏州，王国维又与罗振玉、藤田剑峰等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们一起工作，心情自然是愉悦轻松。作为江苏师范学堂的教员，王国维主要讲授修身、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三科。由于有通州师范学堂的前车之鉴，再加上王国维在知识储备和教育思想方面的日渐成熟，特别是他能够站在哲学高度上考虑问题的方法，使他在讲授以上课程时得心应手，也因此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鉴于王国维的教学能力和成绩，罗振玉及时拔擢他担任中文总教习，使他将自己的学养更充分地传授给学生。不过，一场变故还是让王国维结束了他人生中这一短暂而美好的教学时光，使他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离开苏州，离开他的江苏师范学堂讲台和留园，回到海宁老家周家兜的那栋老宅院里。



一九〇五年江苏师范学堂开学合影，第三排左起第六人为王国维。刊于《教育世界》第九十三号。

关于使王国维离开苏州的那场变故，应该从罗振玉和张謇这对老朋友之间的芥蒂说起。原来，以办理教育而遐迩闻名的罗振玉，在新任江苏巡抚端方的特别邀请下，担任江苏教育顾问，主要任务就是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学堂建成后便出任监督（校长）。不料，在学堂招生问题上，罗振玉拒绝为当地士绅“开后门”，坚持苏州和江淮等地生员一律凭考试成绩录取，这使当地士绅极为不满。随后，当地士绅趁罗振玉返乡料理父亲丧事之机，煽动苏州籍学生驱赶外地生员以激化事端。接着，张謇以江苏教育会会长的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将矛头直指学堂监督罗振玉，指斥他占用学校土地建造私宅。对于这一指斥，远在淮安老家“丁忧”的罗振玉很是气愤，只好向苏州地方当局辩解说，自己建造的私宅在师范学堂围墙之外，并表示说原本为迎养父亲而建造的这座私宅，现在愿意捐献为公所有。同时，罗振玉针对张謇在报刊上发表指斥自己的文章，也在上海报刊刊登了相应的“答辩书”。经此事变，罗振玉随即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一职，继续在老家“丁忧”不出。

随着罗振玉的辞职，由他一手聘请的日本籍教员纷纷离开江苏师范学堂，一直追随罗振玉的王国维也旋即辞职，返回浙江海宁开始了他蛰居潜学的日子。

三 辗转独自学 跨界任纵横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罔
不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
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
第一境界也衆裏尋他千百度
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此第三境界也然豈易得哉今之學
人但有第二境界即衣帶漸寬終
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即可名世
成家豈今不古耶

常次郎兄大正

海甯王國維

